

胡鞍钢集

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十大关键

开放丛书 ● 中青年学者文库

ZHONGQINGNIAN

XUEYIHEWENKU

● KAIFANGCONGSHU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胡鞍钢集

——中国走向 21 世纪的十大关系

胡鞍钢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年·哈尔滨

(黑)新登字第 5 号

胡鞍钢集

HUANGANG JI

——中国走向 21 世纪的十大关系

胡鞍钢 著

责任编辑:李亚晨

封面设计:安振家

责任校对:曾一丹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6.5·字数 380 千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7-5316-2905-4/F·131 定价:18.00 元

自序

5740/21

勇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

人生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人应该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做一名人生的强者,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同样更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不知影响了多少代、多少人。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曾经当过农民、工人,后来又上过大学,留过洋,现在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也是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成员。作为共和国承前启后的一代,个人的命运始终与民族的兴盛与衰败、国家的发展与曲折紧紧地连在一起。为中华民族的繁荣、祖国的强盛而奋斗,既是我人生之路之目的,亦是我学术研究之宗旨。

学术研究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劳动和创新活动。我主要从事中国国情研究。现已正式出版中国国情研究系列著作15部,其中个人专著4部,2人合著4部,3人以及3人以上合著7部。其中《生存与发展》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并发行了海外版和英文版。《中国国家能力报告》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转让版权,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海外中文版(牛津大学出版社是1992年才开始出版中文图

书)。上述著作反映我以及我的合作者关于中国国情分析和经济发展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和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国家宏观决策产生了积极作用，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反响。

人生之路从来都不是预先设定的，谁都难以想象会发生什么而不会发生什么。我的孩童时代是一个幸福的时代。出于少年的早熟和良好的家境，除了功课优秀之外，我已学会通过阅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了解国内外大事，诸如古巴危机，中苏论战，越南战争，“四清运动”，以至后来批“三家村”运动。1966年6月，我刚刚小学毕业，还来不及参加初中统考，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从此，我像所有的同龄人一样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当时，我们这些无知的少年还不晓得，所谓“砸烂旧教育制度”的一场文化大革命是对我们受教育权利的无情剥夺，是中国人力资本形成过程的严重中断和巨大损失。我们这代人是这场“文革”运动的牺牲品。尽管当时我还不能理解这些道理，也不可能预期将来的命运。

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生来固有的。在任何一个比较成熟的思想后面都有着相当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知识积累。我对中国国情的最初认识并不是始于书本的理论知识，而是源于20多年前那场波及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9年9月，我同近10万名北京知识青年奔赴北大荒，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农工。当时我只有16岁，正值精力旺盛、年华风茂时节。我在北大荒一干就是7年。凡是去过北大荒或者插队的知识青年都晓得这一生活经历意味着什么！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只有了解农村，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农村生活使我亲身体会了中国几亿农民生存之艰难，生活之贫困，文化之落后。当时我不断思考着：为什么中国广大农村仍然是“一穷二白”？中国如何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我

困惑不解。

——陈群陆毅

艰苦的劳动是一所能把人的意志锻炼成钢铁的學校。记得在我当炊事班长的数月中，每日凌晨即起烧火起炊，直至半夜只身携带田间送饭，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的觉，我硬是咬着牙坚持下来了。我把繁重而艰苦的劳动作为磨练坚强意志、培养奋斗精神的场所，尽管它是那样的平凡、单调、枯燥和乏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1976年10月，我转调到华北冶金地质勘探队，从“修理地球”的农工成为“勘探地球”的钻探工。我与工人们常常出没于穷乡僻壤，跋涉于山川沟壑，劳动条件恶劣，生活环境艰苦。那时我们借住在当地老乡家，绝大多数农民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仍保留着传统农业和自然经济的生产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文化大革命”时最时髦的政治口号却随处可见。这段生活经历使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真正含义。这是我对中国国情最初的然而又是不可缺少的感性认识，也是激发我为改变中国贫困落后面貌最初的然而又是十分重要的原动力。

人对知识的渴望是人类最崇高的追求。但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受到了最残酷的作践，我们这一代人最宝贵的学习机会也被剥夺了。我并不甘心，但我也无力抗争充斥封建愚昧与现代迷信的环境。几乎每日繁重劳动之余，我都在拼命地读书，通读马列选集和毛选，学习历史和哲学，当然也偷偷地自学数理化，在报纸的余角处演算习题。农村常常缺电停电，我点上煤油灯，以被子作书桌，孜孜不倦地学习。“我要读书”是潜于我心底的强烈渴望。我不敢奢望上什么正规大学，但我决心像高尔基那样自修这所“社会大学”，这将使我终生受益。生活的法则告诉我，失去的将与获得的同等重要。新加坡《联合早报》在发表该报记者“胡鞍钢现象说明了什么？”评论时指出，“胡鞍钢曾经上山下乡，到过北大荒插队，实际了解到了中国农村的贫穷和中国农民的心理世界。

这使胡鞍钢这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今天为中国走向 21 世纪的发展过程出谋献策时,能够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而不至于在书斋里纸上谈兵。”^①

人生的开拓者不是企望和等待机会,而是把握和利用机会。文革结束之后,1977 年高考制度的恢复,给了我们这代人一线希望,给了我们这些知识青年一个小小的平等竞争的机会。我们这代人许多老知青的命运都是从这个高考中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当时我手里拿着初中毕业文凭,但所受教育只不过小学毕业程度,初高中课程都是在农村自学的。我毫不犹豫地要报名参加考试,做一次人生的拼搏。当时地质勘探队的领导劝我不要考大学,我可能列在第一次“长工资”的名单中。我笑着答道,我只有高小毕业文凭,给我一次机会吧。1978 年 2 月底,我接到了唐山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激动不已,这包蕴着我痛苦与奋进、惶惑与坚定的曲折历程;这意味着我学习与实践、探索与思考的新开端。我十分晓得这次机会的重要性,因为我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我常常用这样的话来勉励自己,“滴水穿石”,不断地积累知识,不断地培养能力,不断地勇于创新。社会需求是科学得以发展并不断进步的根本动力,科学创新又强有力地推动社会发展。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接近社会目标,越是有利于社会发展,他的进步就越快,他的才能发挥得就越充分。我是从 1985 年开始潜心研究中国国情的。当时,我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做博士生,选择什么样的论文题目呢?我是根据社会需求作出选择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正经历着急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广泛而深入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过程。我被这一改革与发展时代强烈的呼唤所吸引。1986 年我参加了由学部委员周立三先生领导的中

^①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5 年 5 月 21 日。

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当时，我选择了影响中国现代化最大限制因素——人口问题作为博士论文研究内容，同时也作为研究中国国情的切入点。中国国情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人口过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第一限制因素。1984年以后有的领导人对严格控制中国人口数量增长、贯彻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发生动摇，不断改变人口控制的宏观目标，不断改变人口控制的微观政策，在生育政策开“小口子”，允许更多的农民生育二胎。生育政策变动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思想混乱，随后出现人口失控现象，农民普遍生育二胎、三胎。这引起了一番十分激烈的学术争论和政策辩论，是继50年代的第一次人口问题大辩论之后的发生于80年代的第二次人口问题的大辩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要不要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是教育农民、引导农民，还是向农民让步？

当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自动化所所长胡启恒对我的研究方向给予大力支持，成立了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博士生指导导师小组，他们是：自动化专家何善培研究员、经济学家马宾教授、对策论专家郑应平副研究员、计算机仿真专家马正午副教授。1988年夏季，在导师们的指导下我完成了“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系统分析及人口系统控制对策研究”的博士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我运用了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包括现代对策论、经济学、人口学和系统工程，深入分析中国人口与发展的矛盾关系，较全面地考察人口与就业、人口与消费、人口与城市化、人口与资源环境、人口与经济增长等问题，研究中国现代人口转变特点，预测了中国人口增长的长期趋势，明确地提出应当毫不动摇地坚决严格控制中国人口数量增长，与此同时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就如何教育农民，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我还深入到河北涿县（现涿州市）农村调查，对150多名育龄妇女的生育动机、生育行为以及奖励惩罚效果进行抽样调查，模拟家庭——政府生育对策过程，较系统地

提出控制人口增长的各种对策。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认为,该论文可谓是集中国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之大成。作者运用多科学交叉研究的方法,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使整个问题的研究及其结论取得突破性进展,这样的论文在国内还不多见。它而我国长期(特别是下世纪初和上半叶)的发展问题研究很有开拓意义,对国家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工作具有针对性和指导作用。而后,我又将博士论文改写并出版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中文两部,英文一部)。

“每一时代都有它不幸的危机与负担;每一时代都孕育着它难得的机会与希望;每一时代都要经历它艰难的改革与发展。”1988年底,在周立三院士领导之下,我作为第一执笔人代表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完成第1号国情报告《生存与发展》。该报告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长期不容忽视的四大制约因素:人口继续膨胀与迅速恶化,就业负担沉重;农业资源日益紧张,接近资源承载极限;自然生态日益恶化,环境污染迅速蔓延;粮食需求迅速扩张,粮食增产举步艰难。针对经济发展“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报告指出,中国国情中的限制因素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量变的积累进而部分质变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也必须是坚持持久战。报告还富有远见地提出,中国现代化道路不可能选择西方的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只能独辟蹊径,根据中国国情,寻求一种新的长期发展模式,探索一条中国独特的生产力发展方式。最后报告提出了中国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即保证整个民族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空间;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赖以满足其需要的生存基础与发展能力构成破坏和障碍,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报告的结束语曾写道:“我们正处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时期,同时还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与危机之中。机会与挑战并

存,希望与困难同在。为此,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作为中国的科学家和学者,面对严峻的国情,科学家的良知和历史责任在敦促我们责无旁贷地为民族的生存寻求新的潜力和希望,为国家的发展创造新的机会和道路。”

1989年1月,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报刊陆续报道了《生存与发展》中的若干主要观点,并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响。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调阅了报告全文。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领导同志听取了我代表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的汇报。他认为,经过多年实践之后,人们已开始明白:我们正在并将长期面对人口膨胀,土地和资源不足,生态环境恶化,以及随着收入变化,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同供给短缺的矛盾。如果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恰当的对策,听其自然地发展下去,必然危及民族生存。《生存与发展》课题研究者以“认清国情,分析危机,消除错觉,寻找对策”为旨义,在广泛吸取利用已有资料后,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定性定量相结合,得出了可信的结论。回答了为什么人口增长必须严格控制,经济发展和消费增长必须适度,生态环境必须保护等问题,并提出其它一些应在制订全国的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战略时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教授也亲自听取了课题汇报。他在致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的信中指出,“感谢你们做了一件极有意义且发人深省的工作,并希望该报告能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至少应该树立一种良好的风气,一种尊重客观规律的风气,一种事实求是的风气,认真研究和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和面临的问题,并依此作出正确的决策”。他特别提醒我们,“科学工作者必须坚持讲科学和实事求是这两条。希望读到你们更多的好文章”。

周光召院长的这番话,对我们既是极大激励又是严格要求,至今仍铭记在心。作为一个青年科学工作者,只有坚持科学的原则,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才能维

护科学的尊严。此后，我在历篇国情报告中都保持了这两种风格。后来，财政部副部长（现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项怀诚对我的一份国情报告（指《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评议说：“观点鲜明、逻辑严密、文字流畅、可读性强，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所有引文均详细地注明出处），是该报告的重要特点”。我认为，首先国情报告是一份严肃的科学研究报告，需要对所研究的某一重要社会生活现象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的理论说明。其次，国情报告是一份重要的决策参考报告，需要对国家重大问题提出负有责任的、有独到之见的政策建议。

有人问，你们做研究搞实验吗？我认为，国情研究具有最为广泛的社会实践基础：在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的十几亿人民，从事长达40多年的工业化实践，这是人类活动史中最伟大的社会实验。国情研究就是以这个伟大实践作为认识基础，同时又是对这个实践做出理论认识和经验总结。国情研究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是对中国问题进行零碎的孤立的调查和分析，而是需要进行比较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同时还要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我们的主要作法是：一是使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建立中国和省区两大类经济数据库，十分便利地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二是运用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经济学、系统科学方法的融合，客观地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三是对不同类型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每年我有三个月时间到全国各地调研，掌握第一手材料，这有益于扩大对现实生活的感性认识和对现实问题的深入了解；四是进行国际比较和国际经验借鉴，这包括对发达国家的历史过程了解，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问题的了解；五是对资料数据进行深加工，由此形成重要的观点，重要的结论和重要的建议。

1991年9月，我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作博士后，结识了同校政治学系王绍光博士。我们就改革以来中国大陆中央与地方

关系开展合作研究。当时，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最为广泛的对外开放。这场变革对中国国家能力的变化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究竟是削弱中央政府的作用，还是强化中央政府的作用？是削弱国家能力，还是强化国家能力？对此，我们提出中国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必然是“中央政府主导型”的理论判断。那么，现实的中国国家能力的状况如何？中国的国家能力正在日渐弱化，已经出现财力上“弱中央、强地方”的格局。对此，我们依据市场经济国家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对中国国家能力下降的原因及其后果作出深刻分析。同时就如何提高国家能力，建立稳定的规范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特别是建立统一的现代的分税制，进而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份国情报告审视了中国的改革思路，提出了改革不等于“放权让利”，开放不等于“普施优惠政策”的观点，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阶段——制度创新提供了理论上的参考和决策上的依据。

1993年5月下旬，我学成回国，开始着手打印这份最新的国情报告。当时这份报告的题目是《加强中央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主标题是报告全文的基本结论。6月中旬，我与王绍光博士向北京的学术界和新闻界作了学术报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内部刊物很快摘登了报告的内容提要。6月下旬，我们和财政部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得知，此报告研究的问题正是中央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最有争议的问题，报告提要已经转给中央领导人。我们对这位负责人坦言，想谈一谈报告以外的问题，这涉及到两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一是“削藩”计划。这种“削藩”并非仅是唐宋时期帝王将相似的“尾大不掉”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命令式的地方领导人调动方式，而是从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以及国

家长治久安的角度来重新界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从而建立科学的、统一的、现代的财政制度。

二是避免最坏的结果。这份报告不是就财政论财政,而是把国家能力下降以及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解体这样一种可能性提出来,使决策者能够意识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易经》)。这是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成功的例子是极少的,恰恰不成功的例子很多,例如,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解体。我们的报告就是从最坏的角度入手,通过制度创新、制度建设,以避免最坏的可能性。

7月下旬,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人与我座谈了两个小时。他讲到,通过《中国国家能力报告》,确实看得出,海外学人的确有许多真知灼见,体现出一片赤子之情。我们非常惊叹,你们这样40岁上下的青年人能够独立地、大胆地提出这样有独到见解的看法,并以大量的数据、事实论证自己的结论,我们感到青年人有希望,中国有希望。这番话使我十分感动,也很受激励。9月中旬,我应全国政协财经委员会和科技委员会之邀,对在京政协委员介绍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的研究成果,引起200多名政协委员的广泛兴趣。在我讲课结束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启恒对委员们讲,我们科学院鼓励年轻人从事国情研究,这叫做“小人物议大事”。当时主持会议的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马仪同志连声讲,不必客气,只要讲得有道理就行。马仪同志对我讲,你是做国情研究的,又了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要多介绍,多宣传。

1993年8月26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将实行分税制。促使中国政府下决心摒弃承包制,是因为实行承包制十几年来,国家财力,尤其是中央财力不断下降,宏观调控能力大为弱化。然后新华社转引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的重要成果和观点。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中

央地方分税制,实行统一税制税率。这是我们在《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所提出来的最重要的制度建设的建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马宾教授认为,“关于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建议是一个战略性的思考,需要国家决策机关考虑,也是国家决策机关应予考虑的。同时,也希望和地方政府取得共识”。这部著作在1994年被中共中央宣传部评选为1993年度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

国情研究是一种特殊的创新活动。它的作用不仅仅限于学术意义,更重要的是它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它的传播和影响本身就是一种“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既然国情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社会实践,那么它就要对这一社会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科学依据。社会实践对理论研究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挑战,同时又是理论研究的认识源泉。国情研究本身是一项具有战略性和超前性的学术研究,它不是解释说明领导人的讲话、指示或政策,而是超前于现实人们的认识,对中国重大的发展问题、改革问题做出深入的探讨,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些研究成果又是以科学研究、实地调查、国情分析、国际比较为基础的。中国国情之复杂,是不易认识的,也不是有限知识所能理解的。国情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性的研究。它不限于某一个学科、某一种方法、某一种理论,它是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结合不同学科的理论,例如经济学、人口学、系统科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

《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文章曾把我列为“国策派”的突出代表。^①国策派力求运用自己的知识,对中国当前改革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进行独立的研究,并力求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如国情报告等,来影响政府的决策。90年代以来出现的“国策派”一般均受过更严格系统和规范的学术训练,他们能自觉地从中国改革中产生的

^① 《北京青年报》,1995年2月2日。

“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或某种抽象的既定目标出发，来提出自己的学术或政策主张，他们也更具有学术上的独立性。

国情研究的重要作用是要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我们所撰写的国情报告不仅成为中央决策的重要参考，而且也影响了许多省级、县级地方领导人。我在各地调查过程中，有许多领导干部都是我的“读者”，他们很愿意与我一起探讨重要问题，这也给我极大的鼓励。1995年5月，我与云南省省长和志强第一次见面时，他就讲：“我早就读过你的国情报告，以后还有什么新成果，尽快寄来，一睹为快”。

1995年2月，我受中国科学院委托，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摄制组共同策划，经半个多月的实地考察，拍摄了《西南喀斯特地区贫困与反贫困》专题片，并于3月25日和26日连续播出，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在贵州、云南、广西三省区的领导人和人民中产生极大的共鸣。贵州省省长陈士能见了我就讲：“你为贵州发展作了贡献，你写的贵州调研报告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我要感谢你”。贵州晴隆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全国后列，《焦点访谈》播出后，全国各地有30个单位主动提出与该县合作，帮助扶贫。为此该县县委和县政府专门发来电文，对中国科学院和我本人表示感谢。我很受感动。我在想，我们身居科学院这个中国“宝塔尖”，但我们要主动走向社会，面向大众，多为他们做事情，是理所当然的。

我常对人讲，一个学者向社会提供的研究成果就如同向商品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社会检验研究成果就如同消费者在商品市场购买商品或服务。一个研究者成功与否取决于两点：一是他所提供的成果是否是社会最急需的。如果能较好地满足社会需求，他所提供的研究成果的社会意义就比较大，反之则比较小。二是他所提供的成果是否是“真货”，即真知灼见。如果他也是像商品市场上出售“假、冒、伪、劣”商品，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身败名裂。

事物的发展总是经历一个渐变的过程,质变是长期渐变过程的结果,又是一个新的渐变过程的起点。人的自身发展以及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亦是如此。从普通的农民、工人,到中国最高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员,我对中国国情的认识经历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过程。没有这20多年曲折痛苦的经历和独立思考的过程,便不会有多项国家研究成果。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我们对中国国情了解得愈多,我们的决策失误就愈少;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认识得愈深,我们的挫折失败就愈少。

1995年6月,中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在学部成立40周年纪念会上特别提到以周立三院士为首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所做的《生存与发展》、《开源与节约》、《城市与乡村》、《机遇与挑战》等4个重要的国情分析报告,赢得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评价。同时,他还指出,在科技决策方面,我们再也经不起太多太大的失误。为使重大决策的偏颇和失败降低到最低限度,他指出让科学的声音大些,更大些。同时提高咨询质量,使咨询建议既有全局观点和超前意识,又有可操作性。^①周光召院长的一番寄语,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最近我刚刚完成一部新作:《中国经济波动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我在“后记”中写到,“对我个人而言,每当一部著作完成之时,就意味着新的一部著作开始撰写。唯有脚踏实地艰苦努力,唯有孜孜不倦地学术探研,一个人才能有所进步,有所创新,有所作为,有所贡献”。我也把这些话赠送给青年读者们,以此共勉之。

胡鞍钢

1995年6月

^① 《人民日报》,1995年6月7日。

目 录

自序 勇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	1
引言 努力探讨新十大关系	1

一、中央与地方关系

1.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提要)	21
2. 正确认识和处理市场经济转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	33
3. 市场经济转型期与中央政府作用	41
4. 经济转型期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关系与规则	47
5. 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势在必行	54
6. 抓住有利时机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57
7. 抑制中央财力继续下降至关重要	61

二、发达与不发达地区关系

1. 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	75
2. 中国地区差距研究	90

三、工业与农业关系

1. 农业波动与经济波动	117
--------------	-----